

他有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他有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敢于为信仰而牺牲自我。他就是一代大儒王船山。近日，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谢芳做客国学讲座，以《读通鉴论》为纲，品评历史人物，讲述王夫之的人格审美——

时代需要“君子”+“豪杰”的理想人格

■文/本报记者 许珂 图/本报记者 黄沐



谢芳

“义”与心诚要一致,应排斥利的权衡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而《资治通鉴》则是司马光的著作。《读通鉴论》文采飞扬，议论纵横，新见迭出，论点精到，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同时也全面地反映王夫之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倾向。《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

两书相比，王夫之与司马光有着不同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对“仁义一致”人格推崇和赞赏可以看出。

公元前202年，垓下一战是楚汉之争项羽与刘邦的最后决战。刘邦夺取了帝位，即对项羽将士大加杀戮。丁公与季布都是楚汉之争时期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是刘邦的仇人，丁公是刘邦的恩人，可刘邦却斩丁公而赦季布，这是为何呢？

彭城一战，刘邦遭到了自起兵以来的最大的惨败，楚军依靠项羽坚毅果敢的指挥，在半月之内以3万之师击溃汉军56万之众，歼灭刘邦主力，丁公奉命追击，越追越近，眼看刘邦就要走投无路，刘邦便回头对丁公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两贤岂相厄哉！”好汉何苦为难好汉？丁公一听，居然在两军厮杀的战场上，止步不追了。他当即领兵撤还，等于放了刘邦一条生路。

为什么刘邦一句话丁公就放人？这是刘邦的江湖阅历的本能反应。刘邦被逼到绝境，只能赌丁公也许认同江湖规则，说出了这句话，果然丁公网开一面，把刘邦给放了。等到项羽灭亡，刘邦要开始分封了，丁公来谒见刘邦。刘邦怎么对待丁公？他把丁公拉到军营中示众，说：“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并且特别强调，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对于这个历史事件，司马光是非常赞成的。司马光认为，斩杀丁公是一件符合大义的行为，站在政治家的立场看，一个王朝要想长治久安，一定要讲政治操守。“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意思是当群雄并起争相取胜的时候，百姓没有确定的君主，谁来投奔就接受谁，本来就该如此。但是，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待到贵为天子，四海

之内无不臣服时，这么做就不对了。

因此，汉高祖据大义作出决断，使天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怀揣个人目的布施恩惠给人的人，尽管他救过自己的命，依照礼义仍不予宽宥。这时的大义，可能已经不再是以往传统儒家的以“仁”为基础的大义，而相当于一种权术之计。

那么，作为崇尚孔孟圣学的王夫之又持何种态度呢？王夫之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审美的人格里面一定要包含“义”字。

第一，“义”首先要符合本心即诚心，源自于不忍之心，以良心为法则。王夫之认为，以大义征服天下的人，用的仅仅是诚心而已，义与心诚要一致，才是真正的大义，如果把义当做一种权术和阴谋，来为自己获取利益，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王夫之把斩丁公看作是非，而不是司马光说的“大义”。因为，义是顺乎事理合于人心的，来自心中的诚，把心不忍而为而之称为义，那义就是违背人心了。

第二，“义”应当完全排斥对利的权衡。如，韩信是刘邦夺天下时独挡一面的大将，但刘邦登上皇位，立即借口韩信谋反，将其族灭。对此，司马光认为韩信是市井小人，以为自己有功，希望君主以功报德，给予自己更高的地位，特别是抓住时机要挟君王趁机谋利。所以，这是韩信被处死的理由。然而，王夫之认为致死的原因是其在怂恿君主以利诱惑天下，“君臣相贸，而期报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

第三，义行不应当是因为外在的威胁或利益的诱惑。王夫之认为，若是仅仅为了让普天之下的人都知道“做人臣不忠则必受惩罚，从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个道理，“义”就成为伤害“仁”的“大斧”和导致私利的“诱饵”。所以，刘邦赦免季布的罪过并予以重用，是很好的，足以激励臣子忠君报国，无有二心。至于丁公，废而不用就可以了；杀了他，则是引导天下人忘恩负义。王夫之认为，引导人们行善，不要以某种恶去胁迫他行善，也不能以某种好处去引诱他行善，而应该是它自己发自自己内心深处地觉得应该这样做。否则，就会把社会导向功利化，人人心中都没有情义，只有利益的比较。

崇尚“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人格

刘秀是以西汉皇族后裔的身份，参加推翻王莽篡位所建新朝的农民大起义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艰难百战中扫除群雄，荡平天下，恢复刘汉江山，建立新的大一统的东汉王朝，成为东汉的开国英主。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赞刘秀说：“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意思是，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汉光武帝超过了所有的帝王。王夫之为何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从这个人物评价里面他给予了人格诉求何种审美理想？

原因一，刘秀能以最初的孤弱之军战胜如此众多的乱世枭雄，其对千万战俘的安置凸现了他的雄才大略。王夫之认为，当老百姓丢下锄头、拿起兵器起来造反，其中很多人确实有迫不得已之情，而其中的骨干分子则大多是平时游惰、桀傲之徒。当他们在长期的战乱中过惯了“掠饱而食，掠妇而妻，驰骤喧呶，行歌坐傲”的放荡生活，即使当初有迫不得已之情也忘记了。如果把他们都全部编入军队，那农夫辛勤生产的粮食、农妇拼命纺织的布匹、县官日夜筹措征集调运，也不够供应。如果他们全部勒令回乡归农，但他们已四肢懒惰、不习惯于农业生产，而他们在战争中养成的“恣睢狂荡”的性格，使他们已不甘心屈服于父兄乡党的约束。社会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闻风而起，重新参加造反作乱的队伍。而汉光武刘秀却能妥善处理好这一极大的社会难题。

原因二，刘秀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当时王莽的四十二万大军集结，在王

寻、王邑的率领下，“号称百万”，而刘秀率领的汉兵只有九千余人，这是一场生死之战。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刘秀手下的将领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畏战心理，心理非常害怕，觉得必败无疑都不想打了。而刘秀却“微笑而起”，决心迎战，表现了其从容镇定、成竹在胸的宏大气魄与胆略。王夫之指出，刘秀这种“微笑而起”的从容镇定，不仅是建立在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上，而且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深刻分析与周密筹划上。这是因为刘秀已从敌人表面的气势汹汹中，敏锐洞察其弱点，早已做好战胜敌人的充分准备。再加上刘秀能亲做表率，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因而能以数千之众，一举击溃敌人数十万大军，为后来夺取天下赢得了巨大声威。

由此可见，王夫之所欣赏的人格是：居仁由义、才情兼备、有胆有识、知行合一的英雄人格，即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而外王则是成为圣贤人格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王夫之一生正是践履他所崇尚的理想人格的一生。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期，国破家亡的人生境遇使其期待并呼唤着社会理想人格的出现。他的人格理想是对宋明内圣型圣贤人格的批判基础上通过复兴孔孟圣贤人格的方式来建构的圣贤人格，主要体现在对“经天纬地、建功立业”豪杰人格的诉求，希望通过君子人格与豪杰人格的结合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理想人格，建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



聂亦峰：法官之模范 县令之准绳

聂亦峰，又名聂尔康，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今衡山县）人。咸丰二年（1852年）中进士，并钦点翰林。三年后散馆，在广东石城、新会、南海等地任知县，长达30多年，被誉为“法官之模范，县令之准绳。”

他继承祖先乐善好施传统，每到一地总要捐助建育婴堂、牛痘局、清节堂（为清苦寡妇而设）、宾兴馆（资助贫士考试而设），疏浚城河，修桥筑路，积谷备荒，奖励节孝，捐购地埋葬无主棺骸，访孀（子女，亦指妻子和儿女）心讼棍（旧社会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从中得利的人）。凡地方应办之事无不尽力为之，这些善举深受百姓称颂。

同治九年（1870年），聂亦峰在广东南海当县官。这个县的西村是个大村，只有余、李两大家族。其中余氏有人丁万余，而李氏约两万人，且余富李贫。余氏家族的举人、贡生、

监生很多，还有几人在外省做官，而李氏家族文武两庠均无一人。由于山水地形关系，李氏家族出行需从余氏的地方经过，两大家族之间常有“荫注砍伐诸事涉讼公庭”。每次打官司，总是余胜李败。

有年李氏家族中的李鸿钧，在省城开设制糖作坊，花钱买了个武科举人，第二年因病回乡。李氏家族从来没有科举上的光采，李鸿钧的武科举人被视为家族荣光，族人准备大开祠堂，盛设仪仗欢迎。孰料余氏家族嫉妒，诡称“贵人骨重”，需秤其斤两，竟从轿子里将李鸿钧拉出捆入竹筐内，挂上秤钩，然后把一只狗牵来作为秤砣，并且将之高挂在三只木架上，大庭广众之下加以凌辱。当时李氏族人正集中在祠堂里兴高采烈地等待轿子到来，忽闻此种暴行，一时群情激愤，与余氏家族发生大规模械斗。结果余氏死伤700余人，李姓死

伤1200多人。余氏自知理亏，深恐官厅追查，汇集了30万元到省城活动，托当地制军瑞麟门丁上下行贿，反告李鸿钧谋反。瑞麟遂派聂亦峰率军队前往围剿李氏族人。三日后，瑞麟又增派军队包围西村，一场更大的惨案很可能发生。

聂亦峰是多年的地方官，心中十分明了个中原委。他大义凛然，亲自到第一线说服各路将领万不能开枪，不许部队擅入村中，并千方百计让李鸿钧到案陈诉，即刻真相大白。然而瑞麟却一再下令围剿，聂亦峰五次抗命不从，成功制止了一场惨案的发生。事后，他被罢官回家闲居两年。此事后传入湘军首领曾国藩的耳中，大为动容，决定将女儿曾纪芬许配到聂家。广东巡抚蒋以洋做媒，曾纪芬嫁给了聂亦峰二子聂缉桢。

聂亦峰在咸丰年间和同治年间两任新会知县，在广州任职15年，尽心尽

力，在地方官任上判决了不少疑难案件。后将在任上的禀告、批示、杂文编印成《冈州文牍》，后又续编《网州再牍》。1935年，其孙聂其杰将其扩充成《聂亦峰先生为宰公牍》校刊出版，并收录了聂亦峰咸丰七年（1857年）开始在石城、新会、南雄州、高州府各衙内任职时的公牍，附录《亦峰公办理新会余李两姓械斗巨案》。书前有马思溥及作者序文，聂缉桢的原跋，书后有瞿宣颖的跋文，封面为谭泽闿的书名。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原始史料，是研究清代地方行政运作及基层社会情况的重要资料。

（记者胡建军根据市志办提供的资料整理）



新义探析



“万人空巷”

■高翀

“万人空巷”是大众熟悉的成语，在报章杂志上常见到。例如：

①长江大桥公路桥也顺利通车。南京城里万人空巷，欢呼的人群涌向桥头。

②在葛沽镇，每当农历正月十六，万人空巷，大人小孩都涌上大街，欢天喜地地观赏花团锦簇、金碧辉煌的宝辇，共度宝辇盛会。

③喜讯传来，首都北京城万人空巷，人们兴高采烈走上街头，在广场举行庆祝游行。

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呢？《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子里出来（观看或参加某些大的活动等），多用来形容庆祝、欢迎等盛况。”《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家家户户的人都奔向一个地方，以致街道空荡荡的。形容庆祝、欢迎的盛况或新奇的事物轰动居民的景象。”其他辞书的释义也大致相同。

“万人空巷”最早出自宋代苏轼《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诗，“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是说杭州千家万户都离家到钱塘江边观潮，以致往日热闹的街巷空无行人了。以上三例中的“万人空巷”与其最初意义一脉相承，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万人空巷”近些年来产生了新用法。例如：

④《向东是大海》播放的时候，宁波城几乎是万人空巷，家家都围着电视机等着收看。

⑤1981年，袁阔成先生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录制365讲的《三国演义》……节目播出时万人空巷，极受好评。

⑥在以广播、电视为主的六七十年代，评书演播艺术也曾经创下过一个时期的辉煌，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人们通过收音机、电视机争相收听和收看评书演播节目。

这种新用法多用来形容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效果好，吸引观众，表示的意义是众多人在家里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致使“街巷空了”，近似“使动”用法。有学者认为这种新用法是误用，也有学者提出这里“巷”应灵活解释为住宅文意才能通，不过巷和宅实在没有语义关系。

另外，笔者在搜集语料时找到一类和“万人空巷”相关的词，叫作“净街王”。例如：

⑦老辈的评书演员也以成为令

万人空巷的“净街王”为至高荣誉。

⑧王杰魁，评书艺术家，生于1874年，卒于1960年，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北京说评书，渐渐享名，因说书时万人空巷，被称为“净街王”。

这里“净街王”中的“街”跟“万人空巷”中的“巷”相呼应，“巷”就是“街巷”。

其实，“万人空巷”产生新义是有其原因的：一是成语内部的构造，这是新义产生的内部原因；二是社会生活的变化，这是新义产生的外部原因。

先说内因。“万人空巷”字面义是指：众多人（离开了居住的街巷），使巷子空了。而这个成语要表达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就是众人聚集某处做庆祝、欢迎等活动的盛况。这种用现象表示效果是汉语常见的表达手段，例如“汗颜”是因为羞愧而使得脸上出汗，所以就用“汗颜”表示羞愧。

“万人空巷”字面上并没有说明“人”去哪里了。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众人都去某个地方，搞庆祝、欢迎活动造成街巷空了；二是众人都回到自己家里，收听广播或收看电视造成街巷空了。“万人空巷”最初的法是指前者，但是后者为“万人空巷”的用法演变提供了空间。

再说外因。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听评书、看节目或参加某种活动都要到一定的场所。现在社会发展了，收音机、电视机已经非常普及，人们在家里就可以收听、收看播送的节目。尤其是电视，可以说其折射了社会变迁，从“万人空巷”围观黑白电视机到高清电视普及百姓人家，贯穿了中国人的生活记忆。

综上，“万人空巷”新用法的产生是有迹可循的，从具体到抽象，使用的语境有迁移和泛化的趋势。笔者查到的最早用例见于1988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电视文化漫议》的文章：“一台除夕电视晚会，能有比三个西欧人口加起来还要多的观众同时收看；一部出色的电视剧播出，万人空巷……”。这一用例距今已有30多年，而且近些年的使用频率也逐渐增高。仅《人民日报》2009—2018十年间，“万人空巷”的用例共83例，其中原用法65例，新用法18例，约占22%。这说明“万人空巷”的新用法使用频率逐渐增加，我们应该关注这类语言现象发生的机制和规范性研究。

（据光明网）

图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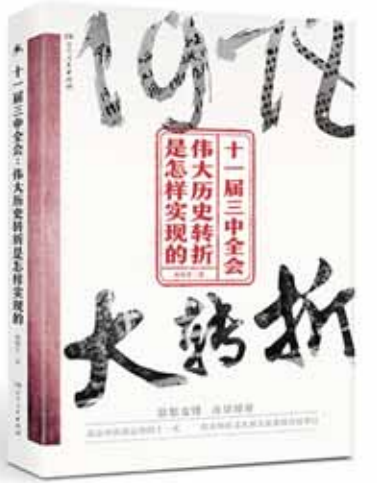


《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是怎样实现的》

张树军 著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为主线，分“中国向何处去”“走向历史转折”“决定命运的36天（上）”“决定命运的36天（下）”“历史转折的宣言书”“伟大的历史转折点”等六大部分，详细记述了这次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幸福街》

何顿 著

路遥文学奖得主何顿现实主义新作，讲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在历经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遭际和情感的故事，通过小人物的命运遭遇，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改革成就。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